

关海宽 著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研究

经验·问题与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海宽 著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研究

经验·问题与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经验·问题与
路径选择/关海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89 - 1

I. ①改… II. ①关… III. ①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16②D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81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2)
二 学术研究现状与简要评析	(17)
三 研究方法	(33)
四 内容安排	(34)
 第一章 前提性概念和基本理论分析	(37)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	(37)
一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历史选择	(38)
二 中国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42)
三 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	(48)
第二节 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53)
一 意识形态的定义、特征、类型和功能	(53)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内容	(66)
第三节 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74)
一 改革开放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提供动力和创造条件	(75)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制着改革开放的 方向和道路选择	(77)

三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统一与融合	(79)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回顾与总结	(86)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考察	(86)
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	(87)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初步探索	(92)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98)
四	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101)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	(104)
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经验	(105)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教训	(110)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116)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总体态势分析	(116)	
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	(117)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动力要素	(124)
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分期	(129)
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力求创新与发展	(133)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成功与不足	(139)	
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已取得的成功	(139)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的不足	(144)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面对的基本问题	(149)	
第一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对的思想困惑	(149)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局限产生的思想困惑	(150)
二	“文化大革命”使意识形态建设蒙上的阴影	
形成的思想困惑	(154)	

三 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共生与自主选择 造成的思想困惑	(155)
四 “非意识形态化”引起的思想困惑	(16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对的现实挑战	(168)
一 全球化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现实挑战	(168)
二 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 带来的现实挑战	(172)
三 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冲击	(176)
四 社会转型带来的现实挑战	(178)
第三节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亟待重视与 解决的几个问题	(181)
一 争论中凝聚改革开放新共识	(182)
二 及时解决利益冲突,形成科学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184)
三 消除信仰危机,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	(186)
四 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超越	(188)
五 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之先导	(190)
 第五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有的努力 ..	(192)
第一节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在 的优势和机遇	(192)
第二节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思维层面 的基本要求	(199)
一 强化和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意识	(200)
二 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继承和创新思维	(203)
三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态势,树立开放整合思维	(206)
四 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斗争思维,不可淡化松懈	(209)
五 重视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发展程度,树立以 人为本的理念	(212)

第三节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实践层面

的基本对策 (214)

一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 (214)

二 加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法治化、政策化和
道德化步伐 (224)

三 大力培养能深入基层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社会工作队伍 (228)

四 创建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生态环境 ... (231)

结语 (245)

参考文献 (248)

后记 (265)

导 论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生之年一直在追问、思考和探索。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作终极真理，但依据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反复强调了一个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从而在理论上预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
将不断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立足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顺应时代潮流，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迄今已过而立。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开拓创新的无畏精神和轰轰烈烈的伟大实践，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大大提升。总之，改革开放是被三十多年来的成功实践证明的强国之路，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整体上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与始终坚持其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分不开。20世纪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社会改革中政权解体、崩溃,根本就在于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丧失,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以至于直到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仍处在煎熬中,无法走出困境。此外,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在当前国际综合国力较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共识资源如果严重缺乏或处在较低层次,将不利于民众形成整体的凝聚力,导致社会的离散化。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发生作用,正是避免上述状况出现的关键。因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坚持其在社会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面临的战略任务。特别是在一个充满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全球化语境中,人们面对多元思想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选择的时候,如何强化民众对国家和民族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坚定信仰,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一) 选题的缘起

在当代,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哲学、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各种文献里,我们会经常发现“意识形态”这个词。“无论你是否愿意,意识形态都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你,无论你怎么讨厌,意识形态都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回避意识形态,否定意识形态,甚至说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①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越深入,往往会越自觉地汇聚到意识形态问题上来。意识形态已经

^①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引言)。

成为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主题^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局势，其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优势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引起了党和政府的警惕，学界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此课题纳入到理论研究视野之中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1. 研究这一课题，缘于身处的时代环境

一是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伟大实践环境中。实践证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否定或抛弃改革开放将会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和利益，最终只会死路一条。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着违背改革开放初衷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丑恶与异化现象，但总的来说，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不可阻挡。因此，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公民都应该主动关心、宣传、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稳定和健康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是身处哲学的时代主题理论环境中。哲学家在创制“意识形态”概念之前，就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只是以前用其他的称谓罢了。自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以来，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显性化，逐渐发展成为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起国内外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关注。“当个人以为自己从来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时，他正漂浮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反之，当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处于某种意识形态中时，他才有可能超越这种意识形态”^②，每个人或社会群体都是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主体，这样的主体所利用的媒介及对客体和客体世界的改造也必然体现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意识形态就如同一种普照的光，笼罩着整个主客体世界。只有加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才能促进人类更深层次认识、改造自我和人之外的整个世界，意识形态成为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主题。具体到我们国家，则主要

①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基于如此的时代实践和理论环境，联系到本人的学习、研究兴趣和专业领域，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及其二者的进程和联系，选择这一课题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2. 研究这一课题，缘于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展现出的巨大威力，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的内心世界树立了不可撼动的威信，获得强烈认同。而且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对思想领域内存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限制和消除，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虽然没能彻底消灭旧的意识形态，但却将它们的社会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和封锁，以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和偏见使得不同意识形态难以在中国境内相遇。所以，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可以自由选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绝对统治和权威地位，即使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出现了混乱、挫折和倒退，但也并未从根本上弱化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随着经济、政治、组织体制的变革和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的多样化、多元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泛起及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涌入我国，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选择呈现出多样性和流变的特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被允许合法存在，它们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相当大的市场，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中国古代的和西方的思想观念在多方面适应各类个体与社会群体精神需求而被接纳和信奉，影响着人们的个体和社会行为。毫无疑问，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一元指导地位（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而不能搞多元化，但也不能因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坚决消灭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价值选择，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做是脱离实际的，是不

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应该看到,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仍然起着调适社会心理、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教化和劝人向善等积极的思想作用,其中包括的优秀文化思想成分应该被马克思主义汲取。当然,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披着合法的外衣而存在,其本质是意图消解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为目的制造社会动乱。另外,还有一些人和团体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以隐蔽的方式传播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观点,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企图将改革开放引向歧途。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民众的思维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各种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汇聚中华,形成共生与斗争、碰撞与交流、冲突与对话的错综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如何科学应对需要引起执政者与学界的总结和反思。

3. 研究这一课题,缘于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问题的分析和考虑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现出新的面貌和风采,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就。实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并举是必然的选择。

一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觉和不自觉地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立足国情,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心理特征和民族精神,有助于民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进行的,其宗旨和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从原初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但

不存在根本上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然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和落后的观念也相互影响。各种历史的文化垃圾往往会在这个时期以回归传统的面目出现,各种陈腐的思想也往往打着继承遗产的招牌死灰复燃”^①。这就要求必须对文化传统的内容体系进行批判、鉴别和筛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补充和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服务,扫清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思想困惑和束缚。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我国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渗透和冲击。一些先进的观念、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高效的工作方法被引进来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也进入到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体系借助其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较量,其话语权势有所提升,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势则有所减弱。许多人包括部分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专家、学者极力推崇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和体制,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往往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评判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么完全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要么发出企图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公开或隐晦表达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改易旗帜,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从而将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此外,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极少数人对改革开放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态势的变化充满恐惧,片面认为改革开放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弱化、地位丧失的危机甚至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败和取代,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因而对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持反对或保留态度。有此观点的人虽属少数,但其滋长蔓延及形成的影响不可低估,一旦成势将会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

^① 秦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光明日报》2010年6月3日。

总之，承认推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同时并举是一回事，但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形成有效的思路和对策去做到将二者真正结合起来是另一回事，这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长期面对而又必须适时解决和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4. 研究这一课题，缘于对意识形态斗争历史和目前形势的理解与把握和认清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的需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和差别不再被过多地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停止或消失，“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走向了消亡，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才会最终走向彻底终结”^①。只要存在根本意志和利益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国家仍未消失，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就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自从十月革命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作为国际上存在的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没有间断过。不过刚开始两种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冲突往往很快转化成军事威胁和赤裸裸的武装暴力，使其表现得非常激烈和直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且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而除美国外，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中受到极大创伤，局势动荡，人心思变，在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发展成为在群众中享有广泛影响并有增长趋势的政治力量，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此，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及各自国家内部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氛围相当明显而浓厚，激烈而尖锐。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也许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因意识形态引发的军事威胁和武装暴力战争事件持续存在和发生，这种表现方式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意识形态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态势。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资本主义国

^① 梁建新：《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想——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7 页。

家的遏制、侵略、颠覆，基本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经济的恢复，局势走向稳定。经过长时间直接军事较量、武装冲突的双方形成相对僵持的局面，彼此间逐步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尽管有的只是表面上的承认），因此，虽然“冷战”思维很早就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和践行，但世界真正整体上进入“冷战”端于此时。所谓“冷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问题上，即注重和加强将本国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向对方进行传播和渗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全力利用各种渠道、途径和技术手段禁止、封锁、丑化、嘲讽、攻击对方，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优越性，希望以此使对方从内部瓦解，达到不战（这里的“战”是军事上的战争、暴力或威胁）而胜的目的。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和斗争不再主要诉诸军事，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再加上无论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由于多种原因各国之间矛盾重重，而不是“铁板一块”，人们渐渐的已不像昔日那样简单绝对地根据意识形态的异同来界定敌我了。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斗争虽然存在，但似乎没有那么剧烈了。以至于1960年美国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所著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他指出：“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意识形态学家是一些‘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①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贝尔之所以提出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主要缘于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科技革命成果，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坎坷和失败，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破灭感。其实质上是在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终点和唯一目标，否定

①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465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此种思想倾向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贝尔却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极力吹捧，所以“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提出的同时也意味着它的终结，即“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终结。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相对和平相处和“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背后，资本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斗争工作从未放松，虽然场面上不如战争那样血流成河，但它们对意识形态工作更加专注，效果也更强。平静的局势下暗流涌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推动下的结果。

也许会有人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色根本原因是社会改革开放的失败。可是如果仔细研究那段历史你会发现，当时执政党面对的经济困境、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民族矛盾和社会人心向背并未严峻到可以致使制度倒塌、政权垮台的地步。那时中国社会主义也在经历着改革开放的艰难，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社会上也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动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最终粉碎了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改革开放不仅没有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相反更加坚定了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和改革开放这一关系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为什么面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侵略，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不同的命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选择没有错，选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没错，错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败亡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扩大和深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将越来越复杂，当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生的灾难和我国在当时的清醒应对考验与锻炼了党和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加警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潮。这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

和渗透想要撼动和消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更加困难。鉴于此,资本主义转变了斗争方式,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适时调整,使之更具隐蔽性,目前来看效果明显,确实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地位造成很大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从理论上否定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斗争存在的必要性,提倡非意识形态化。前面提到,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理论,对其本质我们已明确指出,事实上因为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间的攻击和防御非常明显,此理论提出时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被人们所接受,相反还遭到许多学者、专家们的批驳和嘲笑。这恰恰证明了那时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与在思想理论上无掩盖地承认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存在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体上是“裸露的面对面”,直接亮明本质身份的斗争。然而,冷战结束后,为了降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强度,满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斗争的需要,“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泛起,得到继承和发展。以弗兰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学者以社会主义的大溃败来证明“历史的终结”,指出社会主义产生于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意识形态斗争不再重要或不应存在。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民族之间冲突的基本根源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人们的目光不应该再紧盯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放,最好的做法是搁置或抛弃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差异,追求文化或文明的交流、对话、和谐相处才是正确的选择,从而实现了话语转换,兴起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可以起到使对方心理麻痹、戒备放松、免疫力下降的功能,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约瑟夫·奈提出的“国家软实力”,除了印证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自大张狂的心态外,也折射出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主导了世界话语系统,以至于当今世界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泛滥,对民众影响很大。我们国家的情况不容乐观,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看到意识形态对文